

中国
近现代社会
研究丛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国社会之变迁

主编 张静如 刘志强

2

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丛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国社会之变迁

主 编 张静如 刘志强
撰稿人 张静如 刘志强
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丛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

主 编 张静如 刘志强

撰稿人 张静如 刘志强

王 跃 张学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北京丰台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2.5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9 000 册数: 1—2500

ISBN 7-300-01349-X

K·137 定价: 6.75元

自 序

什么是社会史？我以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种专史之上的学科。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总之，研究社会，就要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这样，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范围极为广泛。

研究社会史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社会生活诸方面综合说明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其二，是为深入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专史打基础。近些年，我一直提倡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就是从第二方面作用出发的。党史、革命史研究需要深化，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怎样深化，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搞党史、革命史的人应该学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及其他专史，并把其中有用的内容引进到党史、革命史的研究中。我觉得，这种倡议是很好的，从提高专业教学和研究人员的素质的角度说十分重要。不过，若从深化学科研究的整体看，则显得琐碎。所

以，我认为还是提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更好。它既包括了上述内容，又有整体感。

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如中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谁来革命，如何革命，革命的目的以及建设的出发点、道路、方针和政策、前景等问题，都需要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去解释。仅仅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要研究很多问题，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思想特征及其变迁、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影响、近代中国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迁、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变迁，等等。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特点，除必须研究上面列出的问题外，还应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研究近代中国民主传统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研究近代中国政党的演变，等等。对土地革命战争苏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中国近代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族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研究白区工作更是复杂，现代城市中一切问题几乎都与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地下党机关的设置地点，必须考虑城市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而其工作方法又常常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有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要深入研究党史问题，不研究社会是不行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末，深入考察而不是表面叙述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这样，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关于这方面的想法，我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

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已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只把主要意思说一下。

本来如果有现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就不用我们在此班门弄斧了。可惜,至今无成果可使用,只好做点初步的工作,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状况分阶段理出个头绪来。如果这点成果能够对写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能够对深化党史研究有些帮助,我们的工作就算没白干。

张静如

1991.3.于北京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社会经济	8
第一节 经济政策	8
第二节 工商业	24
第三节 农业与手工业	40
第四节 交通运输	56
第五节 财政与金融	63
第六节 近代城市	76
第二章 政 治	91
第一节 大总统	91
第二节 内阁	101
第三节 国会	115
第四节 地方制度	123
第五节 外交	131
第三章 教育与文化	141
第一节 教育事业	141
第二节 文化事业	155
第四章 社会阶级与阶层	188
第一节 地主、军阀、官僚和买办	188
第二节 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	200

第三节 其他社会阶层	211
第五章 社会组织	224
第一节 职业组织	224
第二节 其他社会组织	245
第六章 家庭	257
第一节 家庭结构与规模	257
第二节 家庭功能	266
第三节 家庭生活水平	271
第七章 社会习俗	287
第一节 日常生活习俗	287
第二节 婚丧礼俗	305
第三节 岁时节令习俗	314
第八章 社会意识	322
第一节 社会心理	322
第二节 意识形态	360
结束语	386

导 论

研究社会变迁，是从动态角度观察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演化，探寻其趋势及导引社会革命的内在因素。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停止，除非人类遭受毁灭。即使在暂时停滞状态下，社会也要缓慢地前进。所以，任何社会形态的变迁，都有它的逐渐进化过程。这种进化在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中，虽然呈现出多种式样，但其趋势是一致的。捕捉这种趋势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踪迹，了解其特点，就可以分析某个社会发展的结局。

当社会演化受到严重阻碍时，社会变迁的形式就可能转化为社会革命。引起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自然要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寻找，但也必须注意承认其动因是多方面的。恩格斯在《英国革命 十八世纪》中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革命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可见，考察社会革命，不得不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

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既然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社会对外封闭的大门，带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进社会现代化的诸种因素，那么中国社会的演化，朝新的方向转变，就会不以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唯其因为是被动的，进程必然极其缓慢。现

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中国社会要存在，只能走这条路。对此，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社会精英，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因而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正是这种力求变被动为主动的尝试。

可惜，辛亥革命没有能完全达到目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把革命成果让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这场革命未能改变社会性质，新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也沦为招牌。而且，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北洋军阀统治覆灭的十几年里，统治者为了个人、派别的私利互相争夺，连年混战，致使社会的进化受到阻碍。

但是，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民主共和旗帜，这毕竟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使社会生活诸领域，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人们的心态、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君主专制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没有在瞬间停止，而是呈现出一种前进的趋势，贯穿北洋军阀统治的整个时期。可以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因素，较之清王朝统治的后期有较大的增长，并以一定速度向前发展。这意味着，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社会被动现代化过程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善，缩短了变被动为主动的距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除短暂的流产帝制之外，名义上一直维持民主共和的体制，大部分时间设有两院制的国会。这种不同于封建君主制的新的政治结构，显然是以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为榜样的。它实质上代表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而在形式上维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因此虽不可能放射出民主主义的光彩，但对新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因素，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既然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统治者就无法完全避免其成为民主精神和原则的象征，无法完全泯灭其对

人们为民主而奋斗的激励作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先进人士逐渐认识到“共和”不过是个招牌，并加以谴责，但人们并不打算改变民主共和制，而是力排一切障碍，设法完善它。所以，当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时候，人们群起攻之，为维护民主共和不惜流血牺牲。社会已经前进，不能再后退，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善良的人们的愿望。在当时，中华民国就是这种趋势和愿望的标志，维护它，完善它，成为人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不要说中华民国之初各派革命势力如何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奋斗，就是在国共合作的人民革命势力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里，大多数革命家和群众，也以打碎假共和，实现真正民主为目标。

第二，既然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统治者就无法完全排除其对专制所起的牵制作用。从孙中山手中劫持过来的革命胜利果实，对北洋军阀集团说来，是一枚难于吞咽的苦果，是个甩不掉的大包袱。一下子废弃，要冒极大政治风险；让它存在，确实带来不少麻烦。丢不能丢，不丢又碍手，真可谓进退两难。他们控制国会、解散国会、恢复国会，废弃约法、制定宪法、恢复约法，来回折腾，目的是力图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如果不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第三，既然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统治者就无法完全压制其有利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有利于现代文明发展的作用。当时不但在国会中有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且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里，也都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一定的职务。这种力量虽然不大，但毕竟存在着。他们运用自己的发言权、立法权、行政权，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进现代教育、文化，提倡民主精神，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既然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统治者就

无法完全抵消其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以及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变革的影响。这种变革在社会各类群体中客观存在着，谁也改变不了它。虽然变革有深有浅、有快有慢，但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中国的百姓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权力不归他们所有。但是，由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以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意志为转移。除非丢掉这块招牌，否则封建专制因素必然要削弱，民主主义因素必然要增长，这种趋势无法逆转。

含有民主主义因素的政治结构，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确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不过，在强调这一原因时，还应该注意另外一些原因。如辛亥革命引起的人们对办实业的观念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又如，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更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否则，谁还敢投资于工商业呢？也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当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之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1924年以后，这种发展受到阻碍，但并未停滞。当然，在这个时期内，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无法克服先天的缺陷，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挣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尽管如此，它的发展，仍然表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较之清王朝时代，新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增长了。

现代工业的发展，推动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研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但相对论、镭的发现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被先后介绍到中国来，而且我国自成体系的学科，如地质学等也进入奠基时期。不仅如此，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实业家还和科学家相结合，用科学技术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一些难题，并使其达到世界水平。

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人们除了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方便外，并没有享受到它所结出的全部果实，因为它不为其所有。但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希望，激励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当时大多数人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预见不到中国的真正出路，然而他们却知道中国的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较之西方国家相距很远，不能不直观地把强盛、富裕和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此外，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物质基础，使他们的政治要求大大提高。

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化，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得到反映。作为一种事业，文化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等诸方面。辛亥革命后，这些领域都不断发生着变化。尽管封建主义的意识、道德标准在这些领域中仍有很大势力，北洋军阀政府也竭力进行控制，然而民主化的因素确实在不断增长。譬如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是受统治阶级的意志制约的。由于当时教育权不在人民之手，北洋军阀政府有权使教育为巩固其反动统治服务。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下令中小学增加读经科目，就是明证。但既然形式上存在着效法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民主共和制，那末在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上，就不能避免向民主化方面发展。民国初年，教育宗旨效法德国，学制来自日本，较之清末已跨进一大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教育宗旨、学制以及课程设置均抄自美国，更使教育领域中的民主化成分加大。被教育者，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所学的课程中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又如出现于清末的话剧，本来就是民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这一艺术形式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里，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一大批有影响的戏剧团体、培养新式戏剧人才的学校及专业刊物，创作了一批有较高艺术性的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剧本，正是人们民主主义意识的增长在戏剧领域

中的体现。它以自己易于被接受的形式，在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观众中，广泛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再如民国以后卫生体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人们观念变化的反映，也说明人们文明程度普遍提高了。

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加显著。这次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给予前所未有的抨击。它向人们灌输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政治斗争的洗礼，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积极从国外引进各种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学说，为改革中国社会设计方案。不管人们各自笃信什么学说，描绘出什么样的改革蓝图，也不管人们之间进行过什么样的争论，比如一直延续到1927年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之类，人们都是真正出于救国的愿望，共同要求国家的独立、强盛，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和生活富裕。在这个过程里，马克思主义也作为新文化的一种被引进到中国来，并逐渐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之中，特别是国共合作时期在群众中发生过较大影响。不过，它传播的时间很短，其宣传的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又不能不侧重于民主主义方面。对一般民众说来，当时很难弄清楚共产党主张的民主主义和国民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或其他政治派别主张的民主主义究竟有何区别，也不懂得在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所以，在这一时期里，一般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观点，始终是大多数群众憧憬未来、投身斗争的精神支柱。

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至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呈现出民主化、文明化的倾向。如社会习俗的变化，有着显著的特点。周谷城在《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中，曾描述过这一时期生活习俗方面的变化。他写道：“至于风俗习惯，

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举例说罢，前此女子只有所谓三从四德最要紧，现在乃有所谓男女平权。前此男女关系，由父母代定，现在乃有所谓自由恋爱。又如饮食起居，前此稍为富裕人家，总唯恐不能表示十足的封建性，于今则中户人家，也都模仿洋人的习惯，唯恐不能十足的洋化起来。前此家宅的客堂中，总以能挂古的字画为上，现在则争着挂油画，摆风琴，悬照片。前此与人相遇，以叩头打拱为客气，现在则以握手脱帽为客气。”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有很大的变化。当然，类似的变化只在少数人中比较突出，而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的变化则很微小，仍然保持着与落后的小生产相联系着的传统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政治因素的存在，毕竟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影响。反对保守、积极进取的精神，鼓舞着人们为实现新的生活而奋斗。

本书的各章，将分别叙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生活诸方面变迁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经济政策

一 经济行政机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与经济建设有关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两个，即农商部和交通部。农商部源于清末的商部。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实业部，以张謇为总长。实业部“司理本国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1〕。袁世凯当政后，因为要多安置人，便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部。根据1912年临时参议院议决的《农林部官制》规定，农林部设农务、林务、渔务三个司，管理农林、畜牧、渔猎、水产、垦殖事务。同年8月，北京政府颁布《修正农林部官制》，将原设三个司改为四个司，即农务、垦牧、山林、水产司。工商部依1912年临时参议院议决的《工商部官制》规定，则设矿务、工务、商务三个司，管理工商矿事务。

1913年9月，张謇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农林、工商两部总长。他上任后，为便于推行自己的实业计划，于是年12月呈请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由他出任总长。22日，袁世凯以大总统教令的形式公布《农商部官制》。官制规定，农商部设矿政、农林、工商、渔牧四个司，管理农林、水产、畜牧、工商矿事务。1914年7月10日，北京政府公布《修正农商部官制》，内容与前官制略同，只是规定农商部增设总务厅，并提高了农商总长的地位，

规定农商总长隶属于大总统。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时，国务院设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个部。将原农商部的有关职责划归实业、农工两部分管。实业部管理商矿及其他实业行政，农工部管理农林、工务及渔牧水利事务。

依据1912年8月19日公布的《交通部官制》，交通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政、航政及有关交通电气事业，设有总务厅及路政、邮政、电政、航政四个司。1913年12月，北京政府对前官制予以修订，将原设的七厅四司改为路政局、邮传局及经理局。1914年7月10日，《修正交通部官制》中又将原设三个局改为总务厅和路政、路工、邮传、综核、铁路会计、邮传会计六个司。此官制颁布后，因实行不便，不久由交通部提交国务会议决议予以废除，仍采用1912年8月19日公布的官制。1927年7月12日，安国军政府颁布《交通部官制》，规定交通部直隶于大元帅，管理、监督并经划全国邮政、路政、电政、航政事务，下设总务厅及路政、邮政、电政、航政四个司。

农林、工商、农商、交通总长等内閣人员的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学历与经历	任职时间
农林部			
宋教仁	湖南桃源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	1912.3—1912.7
陈振先	广东新会	留学美国，清驻美公使馆书记，农林部次长	1912.7—1913.7
罗振方	浙江上虞	举人，直隶知州，民国元年四川盐务司总务科长，财政部金事	1913.7—1913.9
张謇	江苏南通	状元，宣统元年江苏咨议局议长	1913.9—1913.12